

【论 文】

从“西望”到“回归”¹

——1970年代台湾地区的思想转型与人文嬗变

王 东²

摘要：从1970年的“钓鱼岛事件”开始，到1979年的台美正式“断交”，1970年代的台湾地区是在一系列外交挫败中度过。这一系列挫败所造成的时代困局，不仅深刻形塑了当代台湾政治的发展，也对1970~1979年这十年间台湾的思想与文化走向产生了重要而深刻的影响。正是在这一时代困局的激发与催化下，1970年代台湾思想发展与文化演进的整体路向，开始不断突破“核心—边陲”结构的制约，实现了由“西望”到“回归”的历史性转进。1970年代台湾的思想转型与思潮演进有两个基本面向：一个是“回归传统”，另一个是“关怀现实”。从钓鱼岛事件所激发的台湾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的民族主义情感和对“西化”、尤其是“美国化”的全面反省与批判，到对“横的移植”的具体检讨与决然唾弃；从“现代诗论战”中对中国传统的挖掘、梳理、连接与确认，再到“乡土文学”运动中“乡土派”对中国现实主义传统的接引和整合，都一再诠释并不断深化了这两个主题。沿着“关怀现实”的路径进一步思考下去，“现实”是什么、这样的“现实”又是如何形成的等一系列追问，自然便一一浮现出来。人们过去一直习以为常的事事物物和观念习惯，开始被置放在思想火炬的烛照之下。于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世界对台湾的全面支配问题、美日经济对台湾的“殖民”问题、西方文化对台湾思想文化的宰制问题，以及台湾现代思想文化的整体性“失根”问题、民族历史与文化传统的全面“断裂”问题、工业化和都市化过程中社会底层的贫困化问题等等，都在“关怀现实”的时代主题下进入了思想的议程，成为知识分子深入思考、广泛讨论和反复辩难的议题。也正因为如此，1970年代的台湾思想文化界，才能够呈现出比1960年代更加开阔、更为纵深的视野。

关键词：台湾；“西望”；“回归”。

在台湾地区的现代思想文化演进中，1970年代似乎是一个无关紧要的年代。因为，在1970-1979年的整整十年间，既没有1950年代由《自由中国》所点燃的思想硝烟，也没有1960年代由《文星》所引发的激烈的中西文化论战，更没有1980年代以降狂飙突进的“本土化”思潮。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这十年间台湾的思想天空，可谓云淡风轻，波澜不兴。然而，如果仔细梳理这一时期台湾思想文化的变动轨迹，尤其是把这些变动与此前及此后台湾社会思潮的衍生流变结合起来考察，情况则远非如此简单。近年来，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有人已把这个时段定义为台湾现代历史上“关键的十年”，称它是“台湾的文艺复兴年代”；更有人把这十年称为“战后台湾历史上的轴心时期”。本文的目的在于，透过对这一时期台湾思想演进之内因外缘的分析及其衍生流变的梳理，厘清这十年间台湾思想转型与社会文化变革之间盘根错节的关系。

一、从“西望”向“回归”的转进

1960年代的台湾，在由国际“冷战”格局所造成、并随“冷战”局势而不断强化的“核心—边陲”

¹ 本文刊载于《南国学术》（澳门）2016年第3期，第443-455页。https://www.sohu.com/a/118892954_523177 (2020-4-4)

²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结构作用下，不仅在军事、经济、政治诸方面“一面倒”地接受美国的影响，而且其思想、学术、文化也都毫无例外地受到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核心”的宰制和支配。随着美国影响的不断深入，“西化（美国化）主义”甚嚣尘上。在一片“西化”、“美（国）化”的风潮中，台湾社会的上下下都不乏被胡秋原（1910-2004）戏称为“以他人船破后的‘抛弃物’为彼岸者”的各色人等。于是，一方面是欧风美雨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一方面则是中华传统的萎缩、历史的断裂和文化的“失根”。1968年，杜维明在一篇题为《在学术文化上建立自我》的文章中，对当时台湾知识界因深陷“西化”风潮而产生的迷茫、挣扎和思想困局，作过这样的描述：

我们虽然生为中国人，但对中国自己的东西，不论古往今来，都了解得太有限了。学文学的不懂得莎士比亚是耻辱，但没有摸过杜工部是可以原谅的；学哲学的不能不知道康德，但可以完全忽视朱熹；学历史的没读过《罗马覆亡史》是遗憾，但没摸过《史记》却很平常。再进一步来观察，我们对现代中国经济的发展、社会变迁、政治情况又能了解多少？我们对自己的历史文化与现实环境不了解，对欧美的形形色色更是生疏，于是在国内时感到自己是失落的一代，在国外又觉得自己是异乡人，出国前以为出国后就会万世太平，出国后又觉得在回国前一切都毫无意义；未能出国的以出国为终极目标，既出国的却以回国为最后归宿，于是从失落的一代到异乡人到无根的浮萍。

杜氏所谓“从失落的一代到异乡人到无根的浮萍”，形象而又生动地道出了那个年代台湾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和精神状态。正像有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这种“无根失落”和“孤悬于（中国）历史之外”，正是那个时代台湾知识分子普遍的心理状态和典型的文化人格特质。

面对日甚一日的“美化”风潮，遭遇因对自身民族历史与文化的隔膜、疏离和传统的一再萎缩而产生的“无根失落”，台湾思想文化界的一些先知先觉者，一方面开始了深切的反思，另一方面又表现出诸多的无奈。就在杜维明发出要“在学术文化上建立自我”的呼吁之后不久，代表台湾知识界主流言论的《大学杂志》，便在1968年12月举办“在西方文化阴影下的台湾”专题座谈会。应邀出席座谈会的，都是当时有相当知名度的学者和作家，包括颜元叔、郭正昭、王晓波、张景涵（张俊宏）、痲弦、马庄穆、徐正光和洛夫等人。主持座谈会的颜元叔（1933-2012），一开场就把“台湾的中国文化会不会有一日大部分或整体被美国人同化”这个尖锐而又沉重的话题抛给与会者。对颜氏所抛出的话题，与会者尽管见仁见智，看法各有不同，但对美国文化的强势支配，以及“西潮”冲击下台湾社会日趋扭曲的文化心理和价值观念，无不表示出深刻的忧虑。诸如，“美国是个朋友，但这个朋友是个巨人，而我们却成了一个小矮子，和这个朋友怎样维持友谊，怎样纔能维持自己的独立性，这是个严重的问题……我们太小了，文化交流成了文化‘倒流’”；再如，“近年来的台湾，外来文化，尤其是以巨人姿态出现的美国文化，实在对我们具有不可抗拒的笼罩性，几乎对每一个蛰伏于岛上的人都直接间接地发生了撞击与支配的力量。从‘来、来、来，来台大，去、去、去，去美国’这类社会心理的泛滥，从年轻一代留学成狂的追浪里，不能不觉得事态的严重了。许许多多最可敬爱的师友纷纷走了……大家挤在热腾腾的送行队伍里，都明白自己是‘孤独的群众’，内心都有无限的空寂之感”。字里行间，一方面流露出对“美化”风潮的抗拒，对传统萎缩和文化“失根”的痛心，另一方面又分明折射出因无可奈何而产生的无力与苦闷。

思想的转进固然有其内在的逻辑因果，但外在的客观情势也绝非可有可无。历史发展至1970年代，台湾自1950年代以来所处的“核心-边陲”结构，开始呈现出越来越明显的松动迹象。1970年9月，美国把包括钓鱼岛（台湾称为“钓鱼台”）在内的“琉球管辖权”交给日本，由此而引发台湾社会汹涌澎湃的“保钓运动”。1971年，台湾被驱逐出联合国，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R. M. Nixon, 1913-1994）访华，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同年9月，日本与台湾“断交”。逶迤至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台美的官方关系完全中断。这一系列重大的政治外交事

件，以一波强似一波的烈度，不断地冲击着因“冷战”铁幕而日益强化起来的“核心—边陲”结构。台湾社会长期以来在此结构支配下所形成的普遍的文化心理状态和价值取向，也因此而发生急剧的变动。由“西望”向“回归”的历史性转进，正是伴随着这一急剧的变动而底定的。

一波强于一波的政治外交事件，直接催生了台湾社会各界、尤其是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反美情绪的高涨，而在反美情绪的不断高涨中，台湾社会长期以来在“核心—边陲”结构下所形成的近乎“完美”的美国形象，包括美国社会的万事万物，都迅速地变得模糊、甚至狰狞起来。正像时人分析的那样，从美国把钓鱼岛划给日本管辖到台美最终“断交”，都一再说明：“一个虚构的故事已经结束，这个虚构的故事是：美国外交的道义性。”美国的道德制高点既已不复存在，原先“以美国的解释为解释，以美国的标准为标准”的一系列观念与意识，其真理性和正当性也就不能不让人怀疑了。故而，从1970年代初开始，台湾社会中的美国形象越来越趋于负面。到了台美正式“断交”，这种负面形象更是趋于极致。1979年2月出版的《大学杂志》，曾刊登一封题为《现代化是美国化》的“读者来信”，声称所谓“现代化”，其实就是“美国化”，是美国进行“文化殖民的伎(伎)俩”。这年6月出版的《大学杂志》，甚至还刊出一篇题为《美国·CIA·文化侵略》的编译文章，不仅宣称美国是“贪婪永无止境的帝国主义”，而且还历数其“帝国道德观矛盾愈来愈大”，质问美国“是哪门子的精神领导”，断言美国这个“上帝不是万能的”，最后还揭露分设在世界各地的美国文化中心就是“文化侵略的大本营”，对世界各国人民进行“巧而不妙的洗脑”。

与这种由反美情绪而引发的反思、检视、批判美国霸权的声音相对应，在上述一系列政治、外交事件的强烈刺激下，台湾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还油然而生出一种强烈的中华民族主义情感。正像陈映真稍后回忆的那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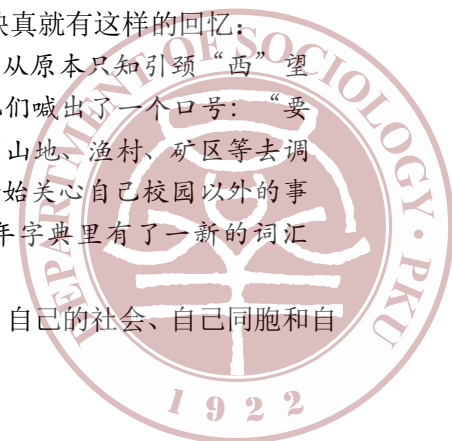
我们过去一个劲地往西方看，一个劲往东方日本看，总觉得人家好，所有美好的名词都与美国、日本连上关系。可是，到了七十年代以后，我们突然发现我们奉以为师、视以为友的“自由世界”重镇，竟冷酷地背弃了我们。……“钓鱼台事件”的爆发，首次启迪了战后年轻一代爱国情绪和民族主义情感，真切地感觉到依附于强国下自己民族的危机。过去，我们对中国的情感和认识，是地图上像秋海棠的一片叶子的中国。我们只在中国现代史的课堂上，读到帝国主义的侵略时，悲忿一番，过会儿就忘了。“保卫钓鱼台”的运动发生之后，青年同学纔真正地在实际运动中参与了自己的民族命运。

从“过去一个劲地往西方看”，到现在“真切地感觉到依附于强国下自己民族的危机”，从反美的情绪性宣泄，到“在实际运动中参与了自己的民族命运”，陈映真以作家兼思想家的笔锋，淋漓尽致地描摹出台湾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在迭经巨变之后的心路历程和思想律动。正是在这种峰回路转的嬗变中，1970年代台湾思想文化的整体发展路径，实现了从“西望”到“回归”的历史性转折。

就思想演进的具体历史情境来看，所谓的“回归”，有两个基本的面向：一个面向是回到“现实”、直面“现实”，关怀现实的社会与人生，关注脚下的土地与人民；另一个面向就是重新建立与自身民族历史与文化的连接。亲身经历过这一历史性转折的陈映真就有这样的回忆：

(由钓鱼岛事件等所引发的)这一切的变化，使年轻的一代，从原本只知引颈“西”望，反转来看自己的本身、自己的社会、自己的同胞和自己的乡土，他们喊出了一个口号：“要拥抱这个社会，要爱这个社会”。于是，有了社会调查的运动，到山地、渔村、矿区等去调查当地的实际生活情形，他们也展开了服务运动……总之，他们开始关心自己校园以外的事物，关心实际的社会生活……这是三十年来第一次在台湾的青年字典里有了一新的词汇——“社会意识”、“社会良心”和“社会关心”。

陈映真所说的“从原本只知引颈‘西’望反转来看自己的本身、自己的社会、自己同胞和自己的乡土”，正是“回归”的第一个面向。



在这一“回归”现实的过程中，台湾各大学都成立了“社会服务团”，在“社会服务团”的推动与组织下，青年学生们上山下海，把“关心社会”变成具体的行动。据《台大社会服务团成立始末》记载：

保钓运动之后，台湾的青年朋友们苏醒了！大多数人不再甘为埋首沙中的鸵鸟，他们开始对国事、天下事付出更大的关切。……许多青年学生已经憬悟到校内清谈不足济事，大家在彼此交换意见的时候，都痛切地指出，青年们除了要作为“社会的气压计”外，更需要作为“洗涤社会，拥抱人民”的先锋队！

这种以“洗涤社会，拥抱人民”为指向的“回归”运动，很容易让人想起半个多世纪以前的五四运动。作家郑鸿生在诠释 1970 年代台湾的思想转型时就认为，由“保钓运动”等一系列政治事件所引发的台湾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思想转型，“可以视为一场五四运动在台湾的历史性重演”。伴随着这种“回归”，一条拥抱斯民、改造社会的道路，越来越清晰地为广大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脚下延伸开来。

与“回归”现实具有内在联系、但具体指向又有所不同的另一个层面的“回归”，就是重新建立与自身民族历史和文化传统的连接，让“失根”的文化接上民族的根系，让不断萎缩的传统接上民族的源头活水。因为，在从“引颈西望”到“反转来看”的过程中，台湾的知识分子已赫然发现：

放眼看看我们今天的社会，向外之心，媚外之风，可以说是空前激烈。光复都已经整整三十一年了，我们的奴性不但没有减轻，反而变本加厉。我们好像永远长不大的孩子，唯恐不被保护，唯恐没有人为我们作主，大家戚戚然，惶惶然，口里不能明说，心里却无不期待一个骑在我们头上的外国“救主”……当一个社会不仅在物质上同时也在精神上失去独立性的时候，大嚷特嚷“复兴”文化，这不是痴人说梦吗？

一方面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的无处不在，以及在此氛围笼罩下所形成的“向外之心”和“媚外之风”，另一方面则是台湾社会内部“人人渐渐与自己民族和历史脱节了”，从而产生了“虚无的和无根的状态”。

面对这一残酷的现实，台湾的知识分子遂猛然醒悟到，要改变这种状况，当务之急便是要重新建立与自身民族历史和文化传统的连接，通过民族历史与文化的浇灌，来润泽几近干涸和枯竭的心灵。《大学杂志》1979 年 2 月刊登的“读者来信”，就把“回归”这一重路径清楚地勾勒了出来。这位“读者”在点出了“现代化是美国化”的主题之后，接着便笔锋一转：

我认为（台美）断交之后，吾人正应痛定思痛，好好看看祖先遗（留）下来的……中国文化是中国的尊严和骄傲，难道要用新文化来讨好美国、日本而置民族尊严于沟壑？

作为一名普通的“读者”，以上这段文字显然是情绪性的宣泄多于理性的分析。但是，作者呼吁要“好好看看祖先遗留下来的”，强调“中国文化是中国的尊严和骄傲”，这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当时台湾社会大众的一种普遍心声。这种普遍心声所反映的，正是重新连接民族历史与文化、让台湾社会重新“回归”民族历史与文化传统的新路径。

正因为如此，在整个 1970 年代，伴随着思想的转型，重新建立与自身民族历史和文化传统的连接，一方面抵制和反对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霸权，一方面让已经“丧失独立性格”的文化“回归”其民族根性，让“一再地萎缩”的传统焕发出新的生命，遂成为台湾思想文化的主题。

二、思想“回归”与文学突围

“核心-边缘”结构的持续松动，以及由此而引发的台湾社会普遍的文化省思与思想转型，最清晰、最典型、最集中地体现在这一时期台湾文学思潮的激烈碰撞与急剧转化之中。



从 1950 年代初开始，台湾在国民党的威权统治下，所谓的“反共文艺”、“战斗文艺”甚嚣尘上。为了突破国民党的戒严体制，冲决思想文化领域的禁锢牢笼，到了 1950 年代中期，一些具有自由主义思想倾向的诗人和作家，开始陆续介绍欧美的现代主义文学理论及其创作方法，并尝试从现代主义的美学立场与原则出发从事文学创作。1956 年，纪弦（1913-2013）重整“现代派”，发行《现代诗》季刊，正式把他过去主张的“新诗的现代化”重新定义为“诗的现代主义”，强调“新诗乃是横的移植，而非纵的继承”。同年 9 月，夏济安（1916-1965）主编的《文学杂志》也随之问世，强调“文学可不尽是宣传，文学自有它千古不灭的价值在”，公开表明它与官方意识形态之间的区隔。以《现代诗》、《文学杂志》以及稍后的《现代文学》的创刊为标志，一股既迥异于中国“五四”以来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又显然有别于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台湾乡土写作风格的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在台湾文坛上澎湃开来，并很快汇成为居于支配地位的文学大潮。

现代主义思潮在 1950-1960 年代的台湾地区之所以能够狂飙突进，与“核心-边陲”结构下台湾社会的整体“西化”（“美国化”）倾向有着内在的关联。现代派所标举的“横的移植”，正是在“核心”支配“边陲”过程中，“边陲”思想文化的一种本能反应。正因为如此，伴随着“核心-边陲”结构的持续松动，反思、矫正、突破现代主义的努力与尝试，便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

正像现代主义的思想旋风首先由诗坛吹起一样，对现代主义的反思、矫正、突破也是由诗坛开其端绪的。1970 年代初，在风起云涌的“回归”大潮下，一批新兴的诗社在台湾各地悄然诞生，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龙族”、“大地”、“主流”等。与现代诗派强调“横的移植”不同，这些新兴的诗社，在诗的表现形式上主张连接中国诗歌的传统，在内容上则强调关注脚下的土地和人民，从而积极地呼应了 1970 年代台湾思想文化领域“回归”的主题。成立于 1971 年初的“龙族”，就以“我们敲我们自己的锣，打我们自己的鼓，舞我们自己的舞”相标榜，明确地提出了与现代诗派截然不同的创作理念。诗社成立三年后，主事者还就“龙族”命名的缘起，作了特别的解释：“龙”意味着一个深远的传说、永恒的生命和崇敬的形象，“象征我们任重道远的使命”，是“稳重、宽宏、长远，而且是中国的”名字。“主流”则强调诗人、诗歌与现实的连接，鼓吹“将慷慨以天下为己任，把头颅掷向这新生的大时代的巨流”。“大地”更是聚集了当时大学文学科系的青年诗人，在创刊号上他们就高举“厚载万物的大地充满着蓬勃的生命力”的旗帜，一方面强调诗歌创作与脚下土地的关联，另一方面则呼吁冲破“世界性”的雾障，“重新回头审视（中国）三千年伟大的传统”，并殷殷希望《大地》的创刊是“中国现代诗的再出发”。这些洋溢着清新的时代气息、充满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的新兴诗社，以各自的创作实践，开启了对盛行一时的现代主义思潮的反拨与矫正。

几乎就在新兴诗社以各自的创造实践来反拨和矫正现代主义思潮的同时，一股深刻反思和批判现代诗的思想潮流也顺势而发。1972 年 2 月，关杰明在《中国时报》“人间”副刊上率先发表《中国现代诗的困境》；9 月，又发表《中国现代诗的幻境》，延续并深化了此前对现代诗的批评。这两篇论文连同稍后发表的《再谈中国现代诗》，很快便在台湾的文学艺术界和思想文化领域激起轩然大波。1973 年 8~9 月间，唐文标（1936~1985）也先后发表了《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什么人——论传统诗和现代诗》、《诗的没落——台港新诗的历史批判》和《僵毙的现代诗》等，把关杰明对现代诗的批评进一步扩展到对现代主义文学的整体性批判。以关、唐等人一系列批评性文字的发表为标志，一场被称之为“现代诗的论战”遂在台湾文坛和思想文化界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在关杰明看来，所谓“现代诗”，本质上就是在“世界性”和“国际性”等时髦标签遮掩下的一种“文学殖民地主义产品”。他认为，现代派诗人都有“一种个人与社会脱节的千篇一律的病态倾向，以及必然会因此而产生的偏差——对于生活、爱情、死亡与生命等各种重要现实问题的不当看法”，因此，他们“在智慧方面的努力只能带进了一条死胡同”。

如果说关杰明的批判火力直指现代诗的“横的移植”，其矛头所向主要集中在现代诗的过度

“西化”以及与中国诗歌传统的严重脱节；那么，唐文标则将批判的火力主要集中在现代诗的“逃避现实”这一症结上。在唐文标看来，现代派诗人的“逃避现实”可以分成不同的类型：有“个人的逃避”（指“个人顾影自怜的悲伤”），有“集体的逃避”（指由于作者的逃避而引起的读者连锁反应，从而产生集体性的逃避），还有“逃避历史与时代”；有“非作用的逃避”（指“小市民式娱乐性的逃避”，不带有任何作用指向的文字游戏），也有“思想的逃避”（指以所谓“思想”的写作来逃避历史上的政治黑暗年代）；有“文字的逃避”（指以文字的变形来掩饰内心的空虚），也有“抒情的逃避”（指以抒情的、空洞的风月“诗境”来消除和取代他们所处的社会）。唐文目标诗论，主要立足于诗与现实生命的密切联系。现代诗既然时时“逃避”、处处“逃避”、事事“逃避”，当然只能是没有生命的、“僵死”的。

由关杰明和唐文标等人所发起的这场对现代诗的批判运动，很快引起了各方的强烈关注。特别是唐文目标几篇文章，犹如投石激浪，骤然间便引发了台湾文坛的巨大波澜。就连一向以温和著称的颜元叔，也以“唐文标事件”这一耸动的题目，来形容由此而引发的巨大争议。一时间，论辩各方围绕着唐文目标观点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仔细检视论战各方所留下的文字，不难发现：在这场持续了两年之久的论战中，为现代诗辩护者固然不乏其人，但与反对者和批评者的阵仗相比，这些辩护的文字基本上都淹没在反对与批判的滔滔声浪之中。

如果单纯地从文学的角度来看，从1970年代初的新诗社运动到稍后的“现代诗论战”，都是对现代主义的一种反拨、矫正和正面突围。但如果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这种对现代主义的反拨、矫正和突围，一方面固然是在为台湾文学的未来发展开拓崭新的方向，另一方面则是“核心一边陲”结构持续松动后，“边陲”文学通过连接民族传统和脚下土地以重建自身主体性的一种努力与尝试。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无论是新诗社运动，还是“现代诗论战”，承续和深化的都是整个“轴心时期”的思想“回归”主题，即一方面“回归”民族传统，另一方面“回归”现实。在论战的过程中，很多持有与关杰明、唐文标不同观点的人，对文学（诗）的民族性、社会性、时代性也都基本上抱持着理解与同情的态度。颜元叔批评“唐文标是从社会看文学，而非从文学看社会”，并明确反对唐文目标“社会功利主义的”文学观。然而，即使是他，也主张“我们期待的文学，应该是写在熙攘的人行道上，写在竹林深处的农舍里”。所谓“写在熙攘的人行道上，写在竹林深处的农舍里”，强调的都是文学的社会性与时代性这个主题。正因为如此，陈映真对这场论争曾有这样的总结：“相对于‘现代诗’之‘国际主义’、‘西化主义’、‘形式主义’和‘内省’、‘主观’主义，新生代提出了文学的民族归属，走中国的道路；提出了文学的社会性，提出了文学应该为大多数人所懂的那样爱国主义的、民族主义的道路。他们主张文学的现实主义，主张不再叙写个人内心的葛藤，而是写一个时代、一个社会。”这样的评论，应该说是恰如其分的。

三、“回归”主题的拓展与深化

台湾学者詹曜齐认为，“新诗论战从关杰明、李国伟到唐文标，反对现代主义的言论都以社会现实的状况作为他们与现代主义者之间的差距。在他们的文章中不时出现一种对现实缺席的焦虑，仿佛为当时文坛寻找关怀社会的方向，成了这些反对现代主义者责无旁贷的任务”。但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对现实缺席的焦虑”，并不等于就把握了现实、理解了现实。囿于当时的政治情势，从关杰明到唐文标，他们笔下对“现实”的关注，基本上还停留在抽象的理论层面。

其实，沿着“关怀社会的方向”一路前行，并以自己的创作实践描摹出台湾社会真情实况的，是稍后的“乡土文学”作家。胡秋原在比较了“乡土文学”作品与现代主义文学作品之后，得出了这样的基本印象：

这些作品（即乡土文学作品）与上述“西化主义”、“现代文学”恰成对照，也可说是

对抗前者而起的。在这里，没有“六代繁华春去也”的将军、贵族和名女人，也不是鄙视自己的父亲之大学助教与学成归国的留学生，或者因接近美国的金斯堡、费林格蒂而灵犀顿悟，站在帝国大厦上想到自己是中国人而感到耻辱的“诗人”。在这里，是台湾农村、小镇或工厂中的“小人物”，一些勤劳、朴实，被命运或“头家”颠倒捉弄的小人物。在这里，没有快乐的场面，或者漂流在灰暗的哀愁中，生活在衣食之挣扎中……

正像有学者所分析的那样，“使乡土文学独树一帜的便是它介入现实的入世精神。典型的乡土文学作品，通常描写乡下人和小镇居民在经济困顿下的艰难处境。乡土文学的故事场景经常是工厂、农村、渔港或某个日渐凋零的城镇，几乎所有主角，都出自卑微”。

从1970年代台湾社会的具体历史情境来看，“乡土文学”的提倡者与作家，事实上从一开始就陷于两面作战的境地。一方面，他们既要“写实”，就势必要与标榜“为艺术而艺术”的现代主义派发生正面的冲突；另一方面，他们运用“帝国主义”、“殖民经济”和“阶级”等新概念来着力刻画社会底层人物，揭示他们的困顿、挣扎与痛苦，则又很容易让人联想起中国大陆从1930年代开始发展起来的左翼“工农兵文艺”，而这又是国民党的威权体制所无法容忍的。可以说，正是在这两者的夹击之下，纔爆发了“乡土文学论战”。

关于“乡土文学论战”的详细过程以及各家各派的具体观点，学术界已作了充分的梳理与研究。限于题旨，这里只关注这场论战背后所隐含的深刻而又复杂思想和意识形态意涵。

从台湾现代思想起承转合的历史过程来看，“乡土文学论战”亦如稍早前的“现代诗论战”一样，也是以文学论争的形式，诠释并深化了这一时期以“回归”为主题的思想转型。1961~1970年，正值台湾经济发展史上的所谓“起飞”阶段，十年间的年均增长率达10.24%。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台湾的社会也开始发生结构性的变化，城市化的水平日益提高。就城乡人口比重来看，到1980年，农村人口所占比重已从1946年的58%降到了21.5%，城市人口则占总人口的四分之三。于是，一方面是城市的高度繁荣，另一方面则是农村的日益凋敝；一方面是整体经济的欣欣向荣，另一方面却是贫富分化日趋严重，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越发突出。学者江帆对此深有感触：

从农业走向工业，是二十世纪落后国家或地区的主要潮流，也是自救图存之道。因此，我们的社会由过去以农业为主体，变成今日以工业为主体的结构，在方向上是正确的。然而，在工业化的过程中，是应该兼顾农业呢，还是牺牲农业呢？工业应该走独立自主的路呢，还是走仰人鼻息的路呢？这两个方针一旦颠倒错乱，则“现代化”走得愈深，所产生的困局便愈大。

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乡土文学”的作家及其支持者，都是力图冲出这种“困局”的先知先觉者。他们以敏锐的思想触角，强烈地感受到了社会的剧烈变动以及由起而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并以悲天悯人的情怀，为解决这些日趋急迫的问题提供了全新的思考方向。正像“乡土文学”主要提倡者尉天骢所说的那样，“乡土文学”运动以及“乡土文学论战”，“并不只是文学本身的问题，它是台湾如费景汉所说的在殖民地经济朝向独立经济的发展过程中的自觉表现，也是岛内因经济发展而产生的改革运动之一环”。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胡秋原把这场论战理解为是“满足现状”和“不满现状”的两种思想路线之争。

就拓展和深化以“回归”为主轴的时代性课题而言，“乡土文学”关于台湾社会真情实况的深描细写倡之于先，“乡土派”关于台湾社会性质的深入分析继之于后。通过“乡土文学论战”，“乡土派”大体完成了重新理解与阐释台湾社会的一整套理论建构，从而把关于台湾社会的“现实”到底是什么、这样的现实又是如何形成的等一系列问题的认识，推进到一个全新的高度。

1970年代的中后期，因工业化、都市化所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开始集中浮现，台湾社会内部的各种矛盾也日趋尖锐。一批具有左翼思想倾向的知识分子，开始追问和思考造成这种现状的真正原因。在这种不断的追问与思考中，他们提出了一套全新的知识言论来诠释台湾的社会性

质，并借由这套诠释来解析台湾的社会矛盾和各种社会问题。“乡土派”的重要领袖如陈映真、尉天骢、王拓等人，正是这批左翼知识分子的代表。根据他们的理解，长期以来，台湾的经济事实上就是美、日等帝国主义的“殖民”经济，文化上则更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附庸”。1976年，陈映真在为王拓的第一本小说作序时，就已经清晰地以左翼的立场阐述了方兴未艾的“乡土文学”写作与中国现代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之间的关系，以及乡土作家所肩负的中国民族主义的责任与使命。他写道：

二十世纪的中国，是一个交织着侵略与反侵略、革命与反革命的中国。为了国家的现代化，为了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自由，她经历无数的苦难，跋涉辽远的坎坷。在这样的中国现代史上，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作家，是不能、也不屑于捡拾西方颓废的、逃避的文学之唾余，以自欺自赎的。因此，带着强烈的问题意识和革新意识的现实主义，从中国近代史的全局去看，是中国文学的主流。从这个观点去看，王拓和台湾多数关心社会、敢于逼视现实中问题点的年轻作家，已经庄严地承续了这个不可抑压的使命……为一个光明幸福的中国和世界之塑造，提供应有的努力。

正是沿着这样的思路，王拓后来在解释“乡土文学”及其发展的文章中，一方面批判1949年以来美、日资本主义对台湾的经济“支配”，一方面揭露台湾文学长期以来深受西方现代主义思潮影响的事实。他十分尖锐地指出：

韩战爆发后，美援物质（资）开始大量倾入台湾，政治上的安定带来了经济上的活力，一批新兴的商人开始在社会上抬头，在美援的经济和物质下成为这个社会的中上层。而渐渐地，原来穿着军装拿武器侵略中国的日本人，却换了一身装扮，穿着西装，提了007的皮包，从新又进入了台湾，开始对台湾进行另一种面目——经济的侵略。台湾就这样在美国与日本的经济殖民主义下，以廉价的劳工与农产品换来了一定程度的经济成长与繁荣。

这种经济上的“依附”，必然导致思想文化上的“依附”，所以，“在这个阶段的台湾知识界、思想界，中国传统的那一套儒家思想在官方的提倡维护下，虽然还勉强维持了一个表面的空壳，实际上却完全抵挡不住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俱来的那套个人主义思想和自由民主价值体系。在美国所提倡和领导的全球性‘冷战’政策下，生活于台湾的知识分子，开始大量吸收西方的思想……而对于中国近代历史上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主义传统，却又完全地割断了、忽略了”；至于文学方面，“生活在台湾的文学作家，便在这种纵的方面割断了自己民族的传统，横的方面却又盲目地放开胸怀吸收西方资本主义的思想和价值观念的情形下，开始了他们盲目模仿和抄袭西方文学的写作路线了”，“造成了台湾文学界相当普遍的缺乏具有生动活泼、阳刚坚强的生命力的文学，而到处散发出迷茫、苍白、失落等等无病呻吟、扭捏作态的西方文学的仿制品”。陈映真稍后在《文学来自社会反映社会》一文中也明确指出，从1953年美援开始，到1965年美援结束，台湾在政治、经济与文化各个层面都是“依附”美国的；1965年以后，则是日本的资本主义经济、文化大举入侵台湾。因此，“1970年以前，台湾不论在社会上、经济上、文化上都受到东西方强国强大的支配。在文学上，也相应地呈现出文学对西方附庸的性格”。

正是基于对台湾经济与思想文化上长期以来所形成的这种“依附”性格的通盘性诠释与理解，“乡土派”的作家和评论家逐渐产生了一种共识，即原先以“写实”为特色的文学创作，除了要关心乡土、关怀城乡小人物的命运之外，还要扩大到对“新殖民主义”的批判以及台湾社会因迅速工业化而产生的阶级矛盾、阶级斗争和社会黑暗面的揭露与批判诸方面。王拓就曾指出，1970年代蔚为时潮的“乡土文学”，乃是作家受客观政治形势冲击而起的反应，“是基于一种反抗外来文化和社会不公的心理和感情所造成的”。正因为如此，这类文学作品一方面洋溢着“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意识”，另一方面充满着对底层社会的同情和对“社会不公”的愤懑。也因为如此，这样的文学已经溢出了一般意义上的“乡土文学”的范畴，它既非“乡村文学”，也不是“乡愁文学”，更不是所谓的“方言文学”或“地方文学”，它在本质上应该就是陈映真所说的现实主

义的文学。至于这种文学的基本特点，便是“对‘西化’的反动和现实主义”。

就思想史的维度而言，由于“乡土文学”的发展以及“乡土文学论战”中“乡土派”对“乡土文学”的定义、诠释与辩护，都是基于对台湾长期以来“西化”（“美国化”）倾向的反抗，是对“西化”背景下台湾工业化过程中所产生的一系列社会问题的积极思考和理论呈现，因此，“乡土派”所着力开掘与反复强调的，依然是“回归现实”这个重大课题。对“乡土派”来说，所谓“关怀现实”，就是要正视（也就是陈映真所说的“逼视”）“西化”背景下台湾工业化过程中所出现的一系列严重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关注底层社会大众的命运。两相对照，如果说“现代诗论战”中的现实主义派还只是在一般的意义上强调关注现实，强调文学与社会、人生的连接，那么，“乡土派”则以自己的创作实践和理论诠释，真正落实了“为什么要关注”以及“如何关注”等更为核心的问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作家杨照在事隔三十年之后，对“乡土文学”运动和“乡土文学论战”作出这样的评价：

“乡土文学论战”中有两个最核心的价值，而“文学”并不在其中。一个核心价值是“现实”，另一个核心价值则是“农村”。如果我们暂时将“文学”的议题放在一边，整理“乡土文学”这边阵营的意见，就会发现其真正的共同关怀，乃在于农村的现实。当他们说“乡土”时，他们心里想的、笔下描绘的，是台湾的农村。……

三十年后回顾“乡土文学论战”，最可能被忽略遗忘的，不是“文学”的部分，不是“文学与社会干涉互动”的部分，而是使得这些议题更根本的政治经济变化带来的感受，亦即整一代的年轻人，面对自己生存的农村环境步步恶化，却只能无奈以对的强烈感受。他们无奈以对，却不想无言以对。在因缘际会下，他们找到了文学作为表达这种感受的载体，（于是）纔引爆了“乡土文学论战”。

回到“乡土”，回到农村与农村经济，我们纔能真正与三十年前的“乡土派”深刻的精神焦虑相联系，我们也纔有机会接上他们的感受，进而理解他们为什么会这么深又这么具有实在性的精神焦虑。

说“乡土文学论战”中并没有“文学的议题”，或许失之偏颇；但强调“现实”与“农村”的议题在整体上盖过了“文学的议题”，却是不争的事实。“乡土派”在“现实”与“农村”的议题下所表现出来的“深刻的精神焦虑”，是此前“现代诗论战”中的现实主义派所罕见的；而他们在这种“深刻的精神焦虑”下所从事的关于“现实”和“农村”的文学书写与理论探索，则更是此前的现实主义派所难以企及的。正因为如此，在“乡土文学论战”结束之后，“乡土文学被广为接受。愈来愈多的作家探讨公共议题，文学作品也比以往更常检视社会经济的现实”。从这个意义上来说，1980年代开始的台湾整个人文学术之不断贴近现实、逼视现实、关怀现实的这一重要“转向”，也正是对“乡土派”上述主张的具体落实、拓展和深化。

四、十年总趋势：“回归传统”和“关怀现实”

1970年代台湾思想的转型，是在“核心一边陲”结构持续松动的整体背景下，台湾社会、尤其是知识分子对这个愈发严峻的“多事之秋”的能动性反映与积极应对。正因为如此，就思想的衍生流变与社会现实情境的内在关联而言，这十年间台湾思想的创生与发展，与引发“核心一边陲”结构持续松动的一系列政治外交巨变恰相对应。在这个作为台湾战后历史上“轴心时期”的整整十年里，伴随着国际“冷战”格局与台海两岸局势的风云变幻，走出“冷战”时代的“核心一边陲”结构，始终是台湾历史发展的主题。由于“轴心时期”这一历史发展的主题始终未变，因此，这十年间台湾思想转型与思潮演进的整体方向，也始终一以贯之。

从钓鱼岛事件所激发的台湾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的民族主义情感和对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强权的反思与批判，到《大学杂志》所倡导的“关怀现实”、呼吁变革，1970年代伊始为“时

变”所激发出来的这两大思想课题，在此后的数年间不仅一再浮现，而且随着台湾社会内部的变革而不断地走向纵深发展、引领风潮，从而在很大的程度上引导着这十年间台湾思想的脉动与文化的发展。仔细梳理这十年间台湾思想与文化的发展和演化过程，人们不难发现：由这两个课题所延展出来的“回归传统”和“关怀现实”，既是这个时代思想创生与演化的两大“酵母”，又是整整十年间台湾社会思潮总体演进的基本线索。

对于台湾的现代知识分子来说，“关怀现实”似乎是一个历久弥新的话题。从 1950 年代的《自由中国》，到 1960 年代的《文星》和《大学杂志》，书生论政，蔚为时潮，前波后浪，不绝如缕。但是，在 1970 年代的台湾，这却又是一个具有崭新时代内涵的课题。在长期的“动员戡乱”所造成的寒蝉效应中，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代困局中，1970 年代伊始因“时变”所激出的“关怀现实”的呐喊，已非此前《自由中国》和《文星》那种书生论政所能比拟。书生论政时期的知识分子，还生活在象牙塔中，他们“眼光向上”，以“启蒙者”的姿态播撒自由、民主、宪政的思想种子，把改变现状的希望寄托在民主政治的理想之中。整体来看，他们耕耘、播种，经之营之，但他们眼中只有政治，没有“社会”，因此也就找不到让思想的种子在现实的社会土壤里生根、开花、结果的路径与方向。他们的辛勤“启蒙”，其影响的范围只能局限于大学的校园；被他们真正“启蒙”的对象，也只局限在俯仰于校园的青年学生；他们的殷殷期望，最终也只能停留在理想的地平线上。而 1970 年代初因“时变”而猛然惊醒的知识分子，一方面固然接受了乃师一辈的“启蒙”成果，但另一方面却显然多了一种行动或实践层面的决绝。他们“眼光向下”，尽管改革政治依然是他们永远都挥之不去的话题，但他们已清楚地看到：政治之外，还有“社会”。如果说在威权体制之下，变革政治只是书生的一厢情愿；那么，“向下扎根”、“拥抱斯土斯民”，通过改造“社会”来变革现状，则是一条康庄大道。正因为如此，1970 年代伊始所提出来的“关怀现实”的课题，已完全走出了由《自由中国》和《文星》延续而来的书生论政的固有传统和有限格局，开启了一条知识分子由扎根社会而改造社会的思想方向和实践路径。1970 年代台湾思想文化从 1960 年代的现代主义向现实主义的全面转进，其基本的理路便是由“关怀现实”的时代精神召唤而底定的。

沿着“关怀现实”的路径进一步思考下去，“现实”是什么、这样的“现实”又是如何形成的等一系列追问，自然便一一浮现出来。就是在这样一环紧扣一环、一层深于一层的递进式追问中，人们一直习以为常的事事物物和观念习惯，开始被置放在思想火炬的烛照之下。于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世界对台湾的全面支配问题、美日经济对台湾的“殖民”问题、西方文化对台湾思想文化的宰制问题，以及台湾现代思想文化的整体性“失根”问题、民族历史与文化传统的全面“断裂”问题、工业化和都市化过程中社会底层的贫困化问题，等等，都在“关怀现实”的时代主题下，进入了思想的议程，成为知识分子深入思考、广泛讨论和反复辩难的议题。也正因为如此，1970 年代的台湾思想文化界，纔能够呈现出比 1960 年代更加开阔、更为纵深的视野。

也正是在这样的不断追问与思考中，“回归传统”遂成为当时思想与文化建设的必由之路。由钓鱼岛事件所激起的民族主义情绪，在整个 1970 年代一路高歌猛进，并因此而成为那个时代台湾地区思想文化建设的基本路向。从对“西化”、尤其是“美国化”的全面反省与批判，到对“横的移植”的具体检讨与决然唾弃，从“现代诗论战”中对中国传统的挖掘、梳理、连接与确认，再到“乡土文学”运动中“乡土派”对中国现实主义传统的接引和整合，都一再诠释并不断深化了“回归传统”的主题。胡秋原在 1978 年应邀为尉天骢主编的《乡土文学讨论集》作序时，就用“中国人立场之复归”作为主标题，并以此来诠释 1970 年代的“乡土文学”精神。如果借用这句话来诠释整个 1970 年代台湾思想文化领域的“回归传统”主题，也是最贴切不过的。

